



明代 云南文学研究

■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项目成果
■ 昆明学院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成果

孙秋克二著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明代
云南文学研究



孙秋克一著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代云南文学研究 / 孙秋克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0.7
ISBN 978-7-222-06539-0

I. ①明… II. ①孙… III. ①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云南省—明代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84923 号

责任编辑: 文艺蓓

装帧设计: 袁亚雄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书 名	明代云南文学研究
作 者	孙秋克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8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
书 号	ISBN 978-7-222-06539-0
定 价	48.00 元

序

张文勋

孙秋克教授承担的“2008年云南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明代云南文学研究》已如期完稿并将出版，这是我省地方文学史研究的又一项重要成果，而且是一项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个性的成果。其学术价值不仅对云南建设民族文化强省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对我国明代文学史的研究，也是极有价值的补充。云南地处祖国边陲，又是山高水远，少数民族众多的地区，特定的历史和地域，使云南文学具有鲜明的特色。明代云南文学的大发展，足以表明云南由于多种地域文化、多种民族文化相互交融而形成的多元性和独创性特色。无疑这在中国文学大花园中，可以说是一枝独秀，独放异彩，构成中国文学整体中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说起云南历代文学史的研究，最早出版的专著有《白族文学史》、《傣族文学史》、《彝族文学史》（楚雄彝族）、《纳西族文学史》等，这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集体调查研究的成果，而且都是关于少数民族个别文学史的研究。当然，这都属于云南文学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它们都不能替代云南文学通史。本世纪初，张福三教授等编写的《云南文学史》是第一部云南文学通史，这对云南文学史的研究，也算得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我曾为之写过序。通史要研究史的发展规律，注意历史的连续性和作家作品的完整性，所以不可能对每个时代、每个作家都作深入研究和论述。孙秋克教授的《明代云南文学研究》正好弥补了通史研究的不足，她以断代研究的形式，对明代云南文学作了进一步深入的探讨，其体例不受时间先后的历史顺序限制，可以作专题性的综合研究，也可以作考证式的个案研究，还可以就历史和地域的背景作专章研究。这样更有利于作纵横兼顾、史论结合的深入研究，为写通史提供更翔实的史料和理论依据。孙秋克教授的专著正是在这方面作了许多创造性的探索并作出了重要贡献。

《明代云南文学研究》的创造性成果是多方面的，而其中三个方面的

研究尤为引人注目。从南诏大理国时期的特殊历史到元、明时期，是云南历史文化大转型、大发展的时期，明王朝对云南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开发政策，使得云南在各方面获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尤其是改土归流、屯田屯兵、兴学取士等等政策，使云南迅速扩大了与中原的沟通。作者通过研究得出结论：明代云南已全面融入中华大一统的格局，明代云南文化已全面纳入中华文化的整体视野中。所以明代云南文学的崛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此其一。文学繁荣兴盛，表现在作家群体的出现和众多作品的产生，有大批著名作家和他们所创作的丰富多彩的作品，才能形成光辉的文学史时期。明代云南文学的鼎盛繁荣，体现在有了一大批灿烂的文学明星，他们的文学成就，在云南文学史上具有承上启下，开辟新时代的重要地位，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足以与中原文学大家齐名、填补边疆文学空白的作用。明代云南文学作家群体的出现，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就他们的生平行实来看，有生于斯、长于斯、热爱乡土的本土作家，有许多来自省外的宦滇职官和一些被谪戍的著名学者文人，他们当中多数都告老还乡或弃职还乡，集中精力从事著书立说和培养后学的事业。还值得一提的是少数民族地区世袭土司望族中，也有不少著名文学家，如纳西族的木氏家族，彝族的高氏家族等等。这些特殊的作家群结构，都以汉文化为核心构成多地域、多民族、多阶层的文化群星。作者经过精心研究，把明代云南作家群大致划分为六大类型，不仅可使读者对明代云南作家群的社会背景和创作特色一目了然，还可以通过作家群的生平行实和文化修养，看到汉文化对滇文化的全面影响，以及以汉文字为载体的书面文学成为云南文学主体的历史渊源。此其二。作为云南省社科重点研究课题，孙秋克教授对云南历史上的特殊时期（南明）的一批本土作家如高应雷、文祖尧、苍雪等作了专章介绍，并对他们的生平行实作了细致的考证和研究，附以翔实的创作系年。这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对研究云南古代文学史提供了很珍贵的资料。对“平居陈郭”、王锡袞的创作活动的考证也是如此。此其三。

云南文学史就其内容的丰富性，社会历史背景的特殊性，其多元文化的融合性，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的课题。明代云南文学的崛起，对上述各方面都有充分的展示，故此，孙秋克教授的研究成果，对我们今后的研究也提示了诸多新思路、新领域。至于云南文学的内涵，除了以汉文字为载体，以书面文学为主体之外，如何把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也包括在整体云南文学之内？如何在文学

史上处理这些关系？这都是我们从事云南文学史研究的学者所应思考并付诸实践的重大问题。我提出这个问题固然与孙秋克教授的大著无关，但确乎是从她的著作引发出来的思考，所以特在序文之末顺便提出来。衷心期望孙秋克教授有更多研究云南文学史的新作问世。

2010年2月17日草毕

前言

云南文学崛起于明代。在这块耸立着崇山峻岭，奔流着滔滔江河，鲜花盛开，百鸟欢唱的土地上，一代文学家以地域色彩浓郁，人文底蕴深厚的创作成就，在中国明代文学史上留下了走过的足迹，闪耀着云南文学既往的光辉，也昭示着云南文学充满希望的明天。

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或许对乡土有所偏爱，然而如果连这样的情怀都没有，又何来对同胞、对祖国、对人类的大爱、至爱和真爱？六百多年前的宦滇、谪滇文士从全国各地踏上这片热土，和云南作家联袂歌唱，把产生于红土地上的种种情怀，内化为情意绵长的滇云情结，外塑为刚柔相济的山川形象，那么真切又那么动人地表现了她的种种风情。今天的我们，是否应当在步履匆匆奔向未来的同时，也回顾彩云之南这片精神的家园，领略云南文学与华夏传统的血脉相连？

云南文学在明代崛起，这时期以汉语为载体，以传统诗文为主要形式的创作，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并在保持自身地域特点的同时，实现了与华夏传统文学的融合。明代云南文学的空前成就，是各民族文学精英的共同创造。大理白族诗人李元阳、永昌（今保山）回族诗人马继龙、丽江纳西族木氏家族等，就是少数民族作家的杰出代表。

明代云南文学的发展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轨迹。朱明王朝从经略云南之始，就在军事体制、行政建置、科举文化、社会结构等方面，把云南纳入了大一统格局，为云南士阶层的兴起、形成及文学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大量宦滇、谪滇官员进入云南，明季云南更成为外来文化精英的萃聚之地，也促进了云南文学的繁荣。外来作家和本土作家合力推动了云南文学的发展及其与全国文学的交融。明代滇云文坛群星丽天，名家辈出。我们要从多元因素相互作用的历史语境着眼，从全国明代文学的视野出发，才能比较清晰地概括这时期云南文学的基本内涵，并相对真实地描述其基本风貌。

本书立足于明代云南文学的特点和实际，以诗文为主体，以几大作

家类型及重要作家为基础，构建明代云南文学论述的基本框架。在具体的研究中，则把个案研究与综合阐述、历史语境与文学发展、传统内涵与当代视角、文学交流与地域特色等多种角度结合起来，把文本赏析、史料考证和理论概括作为三个重点，原人、原文，力求立体地呈现明代云南文学的基本特点，实现体例和理论的创新。最后以二十首论诗绝句，对重要文学现象和作家进行简要概括。本书也关注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有所引用则一一注明，并由学生按《新纂云南通志》编制了明代别集简表，辑录了重要研究论著论文索引，希望尽可能为读者提供方便。

然而，一本著作无论用多大的篇幅，都不可能做到内涵表述的完美无缺和理论概括的无懈可击。如果学界同仁和其他读者，能够从本书的具体论述和理论概括中，感受到与云南历史新篇章的揭开同步，明代文学曾经以怎样的态势，在遥远的西南边陲如火如荼，绚丽多彩地开花结果，形成了一个地域文学的独特风貌，则寸心足矣！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明代云南文学的崛起	(1)
一、云南文学崛起的多元因素	(1)
二、全国视野中的明代云南文学	(17)
第二章 宦滇职官的咏歌	(30)
一、洪武以来之渐兴	(31)
二、万历以来之盛衰	(45)
第三章 宦游诗人的心声	(57)
一、“水木心悬三十年”：安宁籍诗人杨一清	(57)
二、“忧国忧民意自深”：其他宦游诗人论略	(65)
第四章 隐逸文学的兴盛	(76)
一、“志不在干禄”：隐逸作家概况	(76)
二、“洗空势利一生心”：昆明郭文	(80)
三、“杨林两隐君”：兰茂和贾惟孝	(83)
四、“留与西南壮颜色”：晋宁唐尧官	(90)
五、“满山空翠淡忘机”：各地州隐逸诗人论略	(93)
第五章 谪戍文士的吟唱	(97)
一、《沧海遗珠》考论	(100)
二、杨慎的滇云岁月、文学思想和创作	(114)
三、杨门诸子与嘉靖云南诗坛之繁荣	(126)
四、程本立等谪戍诗人论略	(144)
第六章 明季遗民作家考论	(150)
一、高应雷创作行实系年	(151)
二、文祖尧创作行实系年	(163)
三、明季第一诗僧苍雪	(175)
四、从俗世到僧侣的担当	(189)

五、陈佐才等诗人的风骨	(209)
第七章 文学家族摭论	(217)
一、永昌府张氏：张志淳、张含、张合	(217)
二、丽江纳西族土知府木氏：木公、木青、木增	(223)
三、宁州土知府禄氏：禄厚、禄洪	(227)
四、大理府白族何氏：何邦渐、何鸣凤、何蔚文	(230)
第八章 余 编	(233)
一、“平居陈郭”考	(233)
二、王锡袞创作行实系年	(237)
三、论明代云南文学绝句二十首	(245)
附 录	(254)
一、本书主要参引书目	(254)
二、按《新纂云南通志》编制别集简表	(259)
三、重要论著论文索引	(273)

第一章 明代云南文学的崛起

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敕令颖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蓝玉、西平侯沐英统领大军征滇，洪武十五年平定云南，接着在云南全境相继建立了与全国中心地区大致相同的统治格局，开始了自汉置郡县，元设行省以来，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在云南空前强大的统治。云南文学在明代崛起，与这个历史大背景密切相关。此前云南文学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却未能汇入中国文学的主流，实现与全国文学的融合，明代的情形则完全不同。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云南文学失去了自己的地域色彩，恰恰相反，由于其崛起之独特语境，地域色彩更为浓郁了。

一、云南文学崛起的多元因素

早在朱明王朝初定天下之时，朱元璋就在洪武七年（1374年）下了《谕云南诏》。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下《再谕云南诏》，诏曰：“今后敢有不遵教化者，加兵讨平之。”接着他对统领云南大军的大将傅友德、蓝玉、沐英等人连下了4道敕谕，云南平定后他又下《特谕云南平诏》，诏告天下臣民共知“大军既临，渠魁尽获，云南已平”。洪武十六年（1383年）朱元璋继下《复谕云南诏》，诏曰：“今云南既平，诸夷服从，故诏谕以更生之恩。”同年他对傅友德、蓝玉、沐英等人连下了5道敕谕，洪武二十年（1387年）再下敕谕给当时的云南布政使司左参政张统、左参议韩钥敕、金齿指挥储杰等9员^①。这些诏谕涉及云南的军事防守、政权设置、社会治理、官员德才等诸多内容，充分表现了朱元璋不仅要平定云南，更要经略云南的雄心。明王朝在云南全面实施的统治，

^① 以上朱元璋诏谕见天启《滇志》卷十八《艺文志》，古永继校点，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使云南社会在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云南文学之崛起，可谓势所必然。

（一）云南的社会变革加速了文学发展

朱明王朝经略云南的基本措施，使云南社会发生了迅速变化，这是文学崛起的重要因素。

在军事上，洪武十五年平定云南后，朱元璋留下其养子、西平侯沐英为云南镇守总兵。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沐英被追封为黔宁王，永乐六年（1408年）沐英的次子沐晟因平定安南（亦称交趾，即越南）有功而被特封为黔国公，授以铁券世袭。军事防守的构筑也充分体现了明王朝对云南的统治强权。以首府为例，天启《滇志》卷二载，嵩明、昆阳、安宁、晋宁等四州，昆明、呈贡、宜良、富民、三迤、禄丰、易门、归化、罗茨等九县“修予疆理，皆樊圃牖户之奥区；诘尔戎兵，为设伏出奇之要领”^①。明王朝对云南其他重镇的建设大抵如此，如澄江府之“秀水前澄，奇山后耸，左有铁池之固，右有三关之警”，北胜州之“一江外绕，三关内固”，大理府之“负山面海，龙关扼塞”^②。

在政权建设上，朱明王朝建立云南统治体系的步伐相当迅速：洪武十五年明王朝改元代云南诸路为府，以中庆路为云南府，改行省为布政使司，置都指挥使司，洪武三十年（1397年）置按察使司。正统十一年（1446年）改麓川为陇川，设宣抚司于陇把。成化十二年（1476年）置临元、澜沧、金腾、曲靖四道。成化十五年（1479年）改木邦宣慰司为孟密安抚司，隶湾甸。嘉靖元年（1522年）复永昌府治，改金齿指挥使司为腾越州，仍置腾冲卫。万历十九年（1591年）设新平县，改直隶新化州隶临安府。二十五年（1597年）改顺宁为流府，二十六年（1598年）改大侯为云州。终明之世，明王朝在云南共设府20个，领州36个，置县32个，又分置各卫所附焉，并和全国同类地区一样，在云南实行了土司制度。从永乐四年（1406年）起，明王朝在云南边远地区陆续增设

①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雍正《云南通志》卷一。

② 陈文撰修，李春龙、刘景毛校注《景泰云南图经志书》，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106、252、262页）。

流官，并据云南“汉夷杂处”的实际设土知府，后期又改土归流，以在全国统治体系内采取特别措施的办法，保证了在汉夷杂处的边陲，其统治政策也切合实际。翻检史册，披览文献，至今我们仍然能够强烈地感受到朱明王朝从建立伊始，就表现了从根本上控制云南的魄力，其巩固政权的重要举措亦贯彻始终。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个王朝如此精心地在云南构建过一个这样严密的统治体系，从而形成了中央政权对西南边陲的强大统治。

在经济发展上，云南被纳入到明王朝的统一规划中。滇云自古幅员辽阔，州府各负山川形胜之势，自然资源丰富，冬无剧寒，夏无酷暑。虽然明王朝自统治云南之始，即贯彻与一般地区相同的赋税制度，但在承担赋税之后，官吏榨取之余，百姓还不至于无以为生。作为首府，云南府的经济状况可资全省参照。万历时期云南布政司参议谢肇淛在其《滇略》中详尽地记载了当时云南府这方面的情况。他说，云南郡雄据滇池，方圆300里，周围平地肥饶千里，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自汉以来风俗豪华奢侈。历史记载说巴蜀的商贾，窃取其苻马、僇僮、牦牛而致殷富。自唐代以来，干戈迭继。明朝统一后以汉法绳之，贡赋繁重，人们饥色可掬。“然田无旱潦，米不转输，山泽之利，取之无禁，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他方乐土，未必胜此也”。其他各府的情况大抵如此，如：“大理……民输赋（缴纳赋税）如竞市，不待催科（催收租税）。百年以来，民以饮博（饮酒赌博）废业田，多逋赋（逃避赋税），胥役怙权鸱张，鱼肉小民，其一变也，网亦少踈云。”“谚曰：‘金临安，银大理。’”明王朝统治者在经济上对云南人民的压榨，在资源上对云南的掠夺，云南珍稀资源的进贡和赋税之重，史载历历，有案可查，但云南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还是让这里相对成为一片安居的乐土。经济基础是文学繁荣的基本条件，诚如谢肇淛所言：“曲靖、楚雄、姚安、澄江之间山川夷旷，民富足而生礼义，人文日益兴起。”^①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别，云南各地的经济发展也不平衡，这正好让我们从正态的分布，看到云南各地经济发展与文学繁荣之间的关系。

在社会结构上，云南有了重大的改变。平定云南后，朱元璋从江南地区大量移民到云南，罪犯更是“尽室以行”，云南逐渐呈现出“土著者

① 李春龙、刘景毛校点《正续云南备征志精选点校》本《滇略》卷四《俗略》，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242、243页）。

少寄籍者多”的状况^①。移民是明王朝经略云南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中，对改变当地社会结构最重要也最有效的措施之一，其中有各种不同的情形，但以屯田和充军为主。林超民先生说：“明代初年，云南户口只有59576户，经200多年的发展，到万历初年已增至471048户。其中军户总计335426户，占71%强。与军事屯田开展的同时，还实行民间屯田。明代还将罪犯贬谪充军到云南，这是明代内地汉人移民云南的一个特点……到明代后期，各种类型的汉族移民的总数已达300万左右。”“明代200多年间……原来土著的‘夷人’与土著化的汉族移民相互依存、相互交流、相互帮助、相互融合形成‘云南人’。‘云南人’这个称谓具体在何时出现已难考订。当不会晚于明代后期。”^②除了常规性的移民，明王朝各级政权所需的官员也大举入滇，他们在云南的停留虽有暂时性，但代代相沿，对云南汉文化传播和云南文学崛起的影响不可小觑。

大量汉族移民在改变云南社会结构的同时，对云南汉化的程度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谢肇淛描述了晚明云南的这一社会状况：“衣冠、礼法、言语、习尚，大率类建业（南京）。二百年来，薰陶渐染，彬彬文献，与中州埒矣。”^③不同于历史学家的记载，云南巡抚顾应祥的《昆明池歌》以生动的形象，抒发了对云南终于与全国“礼乐不异车书同”的感慨^④。明代云南汉文化主流形成进而融入到全国大一统的程度，仅举一二事例即可见其一斑：昆阳人李尚文博学能文，不乐仕进而徜徉于山水之间，尝恨滇中乏书，于是同其子李沧到江南购书千余卷，归教乡人^⑤。一个乡绅出以这样的举动，没有华夏传统文化兴盛的大氛围是不可想象的。乾隆《丽江府志》载，丽江纳西族土司木氏府中有“万卷楼”，楼中所藏“凡宋明各善本数万计，群书锓版，大要俱备”。木氏以文学家族称名，无疑得益于所藏万卷汉文典籍。

云南社会结构的改变还有一个重要表征——本土士阶层的兴起。明

① 《正续云南备征志精选点校》本《滇略》卷四《俗略》，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242页）。

② 林超民《汉族移民与云南统一》，《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③ 《正续云南备征志精选点校》本《滇略》卷四《俗略》，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242页）。

④ 天启《滇志》卷二十六《艺文志》，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版（第888页）。

⑤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雍正《云南通志》卷二十一。

王朝不仅向云南大量移入汉族居民，而且继之以大力兴教办学、推行科举的空前壮举，形成了大量“造士”的实际结果，促使明代云南士阶层勃兴并形成，进而推动了文学的发展。这个在移民基础上云南社会结构的又一重大变化，“从而改变了原来土酋与土民，或部落首领与部民为主的社会结构，促使云南的社会结构与中国内地基本趋于一致……促使云南各少数民族和汉族移民的部分子弟，在接受了儒学教育的同时，逐渐改变原来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跻身于‘士绅’阶层和社会群体的行列，成为云南社会中新兴的独立阶层，发挥着引领云南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①也即是说，跻身于士阶层者无关其民族身份，只在于是否接受了传统文化的教育，或取得了某一级科名。明代云南士阶层的形成，与文学的发展关系甚大。正如春秋战国时代士阶层之兴起极大地推进了文学的发展一样，明代云南士阶层的形成及其对文学发展的推动，比中心地区不过是延迟了两千多年而已。

明代云南社会各方面改变带来的汉化程度之高是空前的，这是文学崛起的重要契机，但对于文学的发展而言，士阶层的影响更为直接，士阶层的形成推动了云南文学的发展，为云南文学汇入华夏文学的主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此前历朝均不能望其项背的。

（二）兴教办学促使文学创作力量发展壮大

笔者认为，外来各类人员带入云南的文化影响，均属集体无意识状态，它虽是云南文学发展的因素，却不可能起决定性的作用。决定性作用必然依赖于统治王朝有意识的作为，才有可能产生，这就是明王朝在云南的兴教办学，在促进士阶层兴起的同时，促使文学创作力量发展壮大起来。云南建学虽始于汉代，但从来没有哪一个王朝达到明王朝这样的力度。朱元璋多次诏谕有关云南教育的问题，继他之后，有明一代的皇帝都重视云南教育的发展。《明太宗实录》（卷一百二十六）载，永乐十年明太宗就曾为云南武定、寻甸、广西等三府请设学校之事，对礼部大臣强调过在边疆兴教办学的重要意义：“学校，风化所系。人性之善，蛮夷与中国无异，特在上之人作兴之耳。”明太宗强调了国家有所作为对

^① 陆韧《论明代云南士绅阶层的兴起与形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于化民成俗的重要意义，可谓言简意赅。

我们仅以云南府庙学和府学的修建为例，即可见明王朝在云南兴教办学的气魄。云南府庙学在五华山右，元代至元年间由总管张立道兴建，兼置学舍，在平章沙木斯迪音拓之后废弃。明初，镇守总兵沐英把兴教办学作为其先期处理的要务之一，在旧址上重建庙学，为以后的扩建奠定了基础。景泰年间云南巡抚郑颺继而兴建了成德、达材二坊，天顺五年（1461年）都督沐瓚继续兴修。弘治十五年（1502年）云南巡按何琛建聚奎楼为讲堂，又增置号舍，嘉靖十年（1531年）建启圣祠、敬一箴亭^①及《视听言动心五箴碑》。万历元年（1573年）云南巡抚邹应龙凿泮池，十八年（1590年）云南府知府易以巽重修殿庑，四十年（1561年）云南巡按邓渼、提学黄琮以昆明县学庙附于府学，四十三年（1612年）云南巡抚周嘉谟、提学张闾迁建明伦堂。崇祯元年，云南府知府王绍旦建文昌、魁星二阁。经历了200余年，云南府学庙终告修建完成。可以想见，如果没有一个王朝从上到下，从中土到边陲的整体意识和对教育的重视，就不可能在辽远的边疆，在如此漫长的岁月中众多大吏代代相传，为兴建一所学校而进行不懈的努力！作为首府，云南府的学校备受重视。天启《滇志·学校志》（卷八）对洪武以来云南府儒学扩建的记载，集中表现了明王朝在云南的兴学之势。沐英在元代赛典赤所建旧学的基础上建儒学，此后历代扩建，到“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巡府都御史周嘉谟、提学佺事张闾，迁府县二学明伦堂于庙门之左右，斋舍、坊表加饰焉。左署陈臬^②，右联武库，仓山^③屏其后，柏台^④距其前，双塔^⑤为文峰，滇池为泮水^⑥，高若登天，成于不日。盖天地建设，留为圣人之居；川岳炳灵，绵衍在兹之脉者乎！”如此气势恢弘的学堂，我们今天遥想，仍不胜向往之情！

① 按天启《滇志》卷十八《艺文志》有《世宗肃皇帝敬一箴并序》，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世宗撰“敬一箴”，并亲注程颐“四箴”颁行天下学校，全国学校纷纷刻碑建亭。

② 陈臬：张布刑法的机构，亦借指任司法官职。

③ 仓山：疑为商山，又名蛇山，连峰叠嶂，雄丽岩峯，云南府城枕其山而临滇池。

④ 柏台：御史台的别称，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前代所设御史台为都察院。

⑤ 双塔：昆明城南东西原有二寺，东为觉照寺，西为慧光寺，其中各有一塔东西对峙，两寺早已不存而双塔犹在。

⑥ 泮（pàn）水：古代学宫前的水池，形状如半月。

云南府学校的建设如上所述，我们再略述州县学宫的兴建：洪武十六年（1383年），晋宁州建学宫，同年呈贡县学宫亦建成；洪武十九年（1386年），嵩明县学宫由知州赵幹幕、戴民俊在元至正八年（1348年）的基础上增建；永乐元年（1403年），安宁州学宫由知州李智明重建，同年建昆阳州学宫；弘治年十六年（1503年），昆明学宫由云南巡抚林元甫和巡按陈天祥建成；弘治年间宜良设县学，正德四年（1509年）知县余志刚建成学庙；隆庆元年（1567年），旧附于安宁的禄丰县学宫由邑人王昱捐款建成；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罗次学宫由云南巡抚陈用宾建成；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易门县学宫由巡抚陈用宾题建，旋即改迁于城南；崇祯中，旧附于罗次的富民县学宫建成^①。其实到弘治年间，无论兴建还是附学，云南府所属地的子弟，皆大抵有学校可上了。作为首府，云南府教育发展的步子自然较快，但其他地区的教育发展速度也并不缓慢，如：永昌府庙学建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曲靖府庙学建于洪武十七年（1384年），元江府庙学建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姚安府庙学建于永乐元年（1403年），腾越州庙学建于成化十六年（1480年）。和云南府一样，在一些没有建学校的地方，也有就近附学的办法，以解决学子受教育的问题。

明王朝在云南不仅广建学校，而且广选良师，对学官和教官的选择均相当严格：“明初教官，多用儒士，后随着科举之实施渐用举人，监生、贡生皆一时之选。特别是‘举监’与‘贡监’两者，在明中后期已成为儒学师资的主要来源。前者即会试下第后入国子监肄业的举人；后者即各府、州、县儒学取得进入国子监深造资格的生员。”^②如《明宣宗实录》（卷四）载，洪熙元年（1425年）改授四川雅州学正何源为土官司衙门吏目，原因是何源“以监生授学正，自陈不通经学，难为师范，愿改他职。上谕行在吏部尚书蹇义等曰：‘非经明不可为人师……量才授职，则人皆效用，官不废事。’”学官自己不愿滥竽充数，皇帝也倡导量才授职，充分体现了明王朝对边疆教学质量的重视。云南教官的标准，并不因为地处边远而有所降低，甚至有以进士充任的。如《明太宗实录》

① 详见《新纂云南通志·学制考二》（卷一百三十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总第六册（第481~483页）。

② 台湾黄文树《明代在边陲——云贵地区的教育关怀及其对当今原住民教育的启示》，辅英技术学院2002年全国关怀研讨会论文。